

# 书共人长久，绵绵史可征

程毅中

徐俊同志自1983年入职中华书局以来，经历过许多职务，做过各种工作，阅历丰富。1991年为了纪念建局八十周年，他参与了《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》一书的编选，曾仔细查阅了中华书局的旧档。出于他对书法的爱好，精心选录了许多珍贵的名人书信。他是个有心人，我相信这时他对中华书局的局史已有了大概的了解，对这些信的史料价值，比我们许多早入职的同仁了解得更多。例如他把向达先生的九封信全部收入了，二十年以后他又对这九封信作了考证和阐释，为向达先生的学术传记作了重要的补充。

2006年以来，徐俊同志担当了修订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工作的重任，由文学专业出身而已学有专长的老编辑转向了历史学科，在边干边学中积累了许多经验，对史部古籍整理有了新的认识，成为中华书局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的新一代负责人。在修订工作开始时就组织人员仔细清理旧档，访问前辈，建立了深厚的文献意识。“文”是书写的记载，“献”的古训是贤人。如孔子所说的：杞、宋二国的文献不足，所以就不能征之为夏礼、殷礼的史源（见《论语·八佾》）。文献才是历史记载的根源。

前贤的记忆还是要靠文字记载才成为“文献”，如蔡美彪先生是从点校本《资治通鉴》到启动修订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工程唯一的、全面的历史见证人，真是古人所谓的“献”，要不是徐俊和他进行过多次访谈，就不会写成《平实而通达的引路人》一文，使我们详细了解了《资治通鉴》与“二十四史”整理出版的缘起。此前蔡先生自己的著作没有在中华书局出版，只提出了不少评论和建议，对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评价很高，他认为新中国学术成绩最突出的是考古发掘、古籍整理、民族调查三个方面，真是高瞻远瞩，独具慧眼。他对中华书局寄予了厚望，真是中华书局的老朋友和引路人。我对此才有了新的认识。

徐俊同志对历史的尊重，对文献的敬畏，对前贤的爱护，驱使他写出了这些充满热情的文章。本书第一篇《王仲闻：一位不该被忘却的学者》，就是产生于重印《全宋词》时查看旧档而产生的一段历史，也折射了二十年政治气候的变化。必须考虑到，1958年点校工作启动的时候，正是推行“大跃进”的时期，所以宋云彬点校《史记》时，上午还要为炼钢铁而劈柴。历史的进程，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规划、计

划，赶不上客观条件的变化。因此我们的工作，总会留下一些遗憾，留待后人继续修订。

在主持修订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的工作中，徐俊对史部古籍整理有了不少新的认识。他对已出的点校本，作了全面的调查和评估，并澄清了一些疑问。正如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写的《修订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缘起》所说的，既保持了点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学术优势，又如实地说明了修订本的重大突破，最后表明：“成为定本”还需要广大读者的考验和后人不断努力。

我们出版业的工作人员，永远只能向读者表示这样的态度。

整理出版“二十四史”最初是郑振铎先生提出的。毛泽东主席一向号召党政干部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1953年提出要编点校本，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赶出来了，毛主席很满意，只是批评了精装本太重，拿不动。1958年提出要印“前四史”，以一年为限，经范文澜、吴晗等人请示报告，再扩展到“二十四史”的整理。中央领导只是提出一项任务，本来不必考虑整理出版的具体细节，但进度总是要快。而实际工作的学者，则总是愿意尽自己所能，把工作做得好一些。因而1959年国庆献礼，只有《史记》因为有顾颉刚、贺次君先生的初稿，总算由宋云彬先生赶出来了。点校《三国志》的陈乃乾先生早起还是赶上了晚集，到1959年底才出书。后来前四史到1965年才出齐，主要原因还是整理者、出版者都出于自己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忠于自己的职业操守，想提高学术质量，尽可能提高校勘的要

求，追求体例的完善。据说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同志1960年还提出了“成为定本”的要求，压力很大。后来唐长孺先生的北朝四史、王仲莘先生的南朝五史，全面执行陈垣先生提出的“校勘四法”，更增加了整理的难度，拖到1965年也没能出书。这都是学术工作者的一片好心，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后果。直到1976年，毛主席也没有看到“二十四史”修订点校本出齐，辜负了老人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厚望。

本来吴晗先生等策划的也是先出“普通本”，另出集注本、新注本，这一点恐怕是我们理解不到位，造成了越来越深的深井。吴晗作为明史专家，恐怕也想不到《明史》的标点会遇上那么多难题。

我个人对上级交办的任务，也总想取法乎上，力求保证质量，但往往延误了时间。如1959年接受了编辑《海瑞集》的任务，当时只知道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曾问过此事，吴晗更积极地写了《海瑞的故事》和剧本《海瑞罢官》等，我估计是有上级领导指示的，所以努力做了校勘、标点、辑佚的整理工作，屡次改版，拖延到了1962年底才出书，又如1962年3月，周扬曾指示要出老专家过去的论文集和专著，周一良先生的论文集就是一个例子，也因误了时机，到1964年就不敢公开发行了（详见本书《周一良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〉出版轶事》一文）。还是1961年，周扬写了一个条子，要出徐文长、汤显祖、郑板桥的集子，交到中华，我又接受了编《徐渭集》的任务。也是一再改版，拖延到1965年才打出纸型。那时文化部已经挨批了，就不敢打印，压到1983年才印出来。因此我的经验教训是上级交付的任务一定要快赶，但又不能草率从事，忙中出错，这使我非常困惑。1973年，我又接受了中央交办的重印《昭明文选》的任务，不敢排印，就提出影印宋刻本的方案，居然被批准了。当时乘机多印了一些，内部卖给曹道衡、袁行需等专家学者，还办了一件好事。但是排印书还是要认真整理，取法乎上，否则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。

1976年，大概是5月份，出版口下达命令，毛主席要看大字本《李太白全集》，中华、商务当时合署办公，社领导动员好几位同仁加急点校，委派周振甫先生和我负责定稿发稿。这次我们不等全书定稿，分卷发排，流水作业，

打出一卷清样就送一卷到中央，大约送出了不到十卷。直到9月8日22点，我和校对科的好几位同事还在新华印刷厂加班校读清样，不料9月9日凌晨毛主席去世了……这次我是急事急办了，可惜还是没赶上。

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教训，也愿与同仁们共享。顺便写下来作为文献资料，附在徐俊的骥尾之后，借以纪念中华书局的110周年。

本书题名为《翠微却顾集》，化用了李白的诗句，与中华书局上世纪“翠微校史”的佳话相衔接而增加了诗意。“翠微校史”的佳话，最早是1963年王仲莘先生等人住翠微路中华书局宿舍时说起（王同策先生在《翠微校史的日子里》一文中，记罗继祖先生的话，王仲莘先生曾提议罗先生画一幅《翠微校史图》，可惜没有实现，现存只有一张陈垣先生家里拍的照片。赵守俨先生哲嗣赵衍兄写了《翠微校史：西北楼里的大师们》一文，已传为佳话）。本书里的文章已成为中华书局局史积累的史源文献，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史料的一个部分。因此徐俊把这本书加上“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”的副标题，并不是自我夸张。

本书为现代的多位专家学者补写了外传，但不是“儒林传”，而是艺文志的大序。这些文章，都是中华书局局史长编的资料，也是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史长编的资料。徐俊在清理档案文献中不断提高了他的史才、史学和史识，而他对前辈业绩的热情爱护，则养成了工作中的一种美德。我感到遗憾的是，中华书局有一时期的部分档案，竟流失在外了。徐俊从网络上搜索到了一些残片，稍稍得以补救，也算是拾遗补缺了。

徐俊同志委派我为本书写一序，我对这些书和人还略有所知，为“二十四史”只做过极小极少的一点工作，但又不容辞，勉力写了一点随感，聊以应命。谨读本书，深为感动，不禁情发乎中，谨以小诗一首为赞：

书共人长久，绵绵史可征。  
中华文与献，千载树长青。

2021年11月11日

（本文系作者为徐俊《翠微却顾集——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》所作序言，该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）



圣罗马诺之战  
(木板蛋彩，三联画之一)  
乌切罗 [意大利]

一般来说，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背景多发生于内陆，很少涉及海洋。《西游记》故事的前身“玄奘取经故事”，原本也是发生于内陆地区的旅行事迹。唐朝与印度海陆往来频繁，鸠摩罗王曾建议玄奘回程向南走海路，但玄奘婉拒了，跟随丝绸之路的商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西域诸国返回大唐。《西游记》最早的故事原型并无明显的海洋文化痕迹。

明代以前，“西游故事”经过不同文体如杂剧、平话等拼贴，形成了独有的故事群落特征，开始糅杂复杂的文化源流，其中就包括了对异域“海洋文化”的接受。这种改变的痕迹非常隐微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：（一）唐僧身世故事中的“水”意象；（二）龙王传说与求雨故事的融合；（三）其他“水难”与“水怪”（与“水”有关的妖怪）的展演。在世德堂本（1592）《西游记》的险难设计中，虽然表面上山难故事多于水难，但“水”的意象还是组成了小说最重要的布景和情节，考验取经人的弱点。有关“水”的渴望与恐惧，构成了明代中国人基于农耕文明而自然型塑的情感结构和神话结构。

## 唐僧身世故事中的“水”意象

今见通行本《西游记》第九回“唐僧出世”故事系清初汪澹漪《西游证道书》增插，也就是说，明代1592年南京金陵世德堂本所刊《西游记》中并没有这个故事。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，历来也有广泛讨论。《唐三藏西游记传》收入了“陈光蕊故事”，以三藏出身为主，叙述他早年所经历的灾难。世本《西游记》反而只留下一段韵文，在清人黄太鸿和汪象旭所编《西游证道书》中，陈光蕊的故事首次成为第九回的主要内容。也就是说，《西游记》原本依据的是玄奘取经的故事，但玄奘的身世作为重要取经故事缘起，反而是清代才补充进去的。1980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回本《西游记》，曾将这“第九回”故事改为“附录”。这一回的目的是“陈光蕊赴任逢灾，江流僧复仇报本”。故事说的是唐代贞观年间，海州平民学子陈光蕊高中状元，与宰相之女殷温娇结婚，不久又被朝廷任命为江州知州。陈光蕊携妻赴任途中遭遇洪水寇刘洪谋杀，被杀沉江，还被刘洪夺妻冒充，温娇为了保护腹中胎儿只得忍耐。生下婴儿后，将他与一封血

书放逐水上，为金山寺法明长老所救，命名为“江流儿”，字面意思是江面漂流的儿童。十八年后，江流儿，也就是陈玄奘长大成人，查清昔年冤案。陈光蕊因龙王救护不死，还阳与妻子团圆。但温娇因失身侍贼，有愧于丈夫，投江自尽。

不难发现，这个故事凸显了“水难”的元素，并且将一些细节做了调整。首先将河南人（籍贯地洛州，即今日洛阳）玄奘改为在沿海（海州弘农郡黎阳）出生，以便让他的父亲能被海龙王所救；其次将唐僧的诞生与一场水难挂钩。他的父母遭遇水上盗贼，盗贼的名字是“刘洪”，与“流洪”同音，唐僧自己也被命名为与水有关的“江流儿”，意为他在水上出生并漂流的悲惨命运。“江流儿”的神话，出现在分布广泛的中国英雄传奇中，如后稷被弃于寒冰而不死，重生以后成为周人的始祖。徐偃王被弃于水滨，为孤独母犬鹄苍所救，最后也成为一代王者。还有彝族传说“铁箱里的淌来儿”等等。另一部中国著名小说《水浒传》，说的也是与水有关的灾难。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视野，会发现这和安放摩西的“箱子”一样，“水”的神秘与不稳定性等特质，都预示人的生命力和神的安排。“江流儿”故事原型也并非中国独有。

《西游记》中“江流儿”故事的诞生，最早来源于中国戏曲文本，并广泛传播。同样，也是戏曲文本最早将该故事编入广义上的“西游故事”群落。目前可知最早讲述该故事的文本，是宋元南戏《陈光蕊江流和尚》。也就是说，“水难”是广义上西游故事群落中出现时间较早的故事原型。戏曲中类似的官员携妻赴任新职，遭遇水寇，于江心被杀，多年后真相大白的故事还有很多，如唐代《原化记》《乾月翼子》，或另一则话本故事改编的《白罗衫》，都在民间广为流传。世德堂

本《西游记》把“江流儿”故事删除，只保留了一段唐僧出身的韵语，这是因为，戏曲之外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典籍中，并没有确切提到陈光蕊是唐僧父亲的说法。但显而易见的是，《西游记》核心人物唐僧的故事与“水难”直接有关，这段故事里“龙王相救”的段落也是西游“水难”故事的经典范例。

## 龙王传说与《西游记》中的求雨故事

《西游记》中，“龙王”的情节占比非常大，他经常承担救援的工作（《西游记》中也有不好的龙王，如万圣龙王就是盗贼）。水神的存在，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不可控之力，和对控制风雨的欲望。以“魏征斩龙”传说为代表，它是隶属于《西游记》取经缘起的故事之一，讲述的是泾河龙王与木士袁天罡打赌降雨时辰，袁天罡算中后，泾河龙王为了赌赢私自改了行雨的雨量和时辰，被玉帝发现要被砍头，托梦向唐太宗求情，却还是被魏征斩首的故事。《西游记》中龙王的主要职能是司雨，也就是管理下雨，下多少滴雨却要听命于玉皇大帝的严格安排，违反规定会遭遇严厉惩罚。有学者认为，中国的四海神及龙王信仰中并没有赋予龙具体的司雨职能，季羨林先生就曾提到《西游记》中的龙王故事受到了印度龙神崇拜的影响。龙王有一些特点可能也与这个来源有关，诸如宝贝多、财产多、子女多、亲戚多等等。《西游记》中只有三个重要人物有家庭——猪八戒、牛魔王、龙王。

世界文明中的龙主要有三个源流，分别是印度、西欧和中国。最近出版的《龙王的嬗变：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的人类学透视》一书中就重新梳理了中国白族（云南大理地区）水神信仰体系，给我们理解《西游记》带来很多启迪。学者赵楠在《论白族龙文化》

一书中也曾提到，“白族的社会生活实践中，凡是与水有关，就必然有‘龙’的观念的出现”。这里的“水”也不只是“雨水”。明代李元阳撰文的《赵州甘雨祠记》中记载，嘉靖年间，大理多地久旱不雨。为了求雨，赵州州首去漱龙潭求雨。途中遇到一条蛇，他听人劝告拿出祭品和瓦罐，到了傍晚，赵州郡内果然大雨如注。其实，为了求雨，“龙”和蛇（小龙）也不是唯一的吉祥物，古人还曾祈求过蜥蜴、青蛙等。古代的农业生产取决于大自然的支配，古人尤其重视风调雨顺，而掌管风调雨顺的神明就显得特别有权力。

对“雨水”的共同渴望可能与中印两国农耕文明的背景有关。孙悟空曾因沿路遭遇旱灾求助，如第八十七回“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”，当地居民因过得罪了玉帝，被惩罚三年无雨可下，可见雨水最高的管理权在玉皇大帝手中。但龙王有自己的办法私藏雨点帮助孙悟空，一次是观音菩萨为灭红孩儿的三昧真火，就向龙王借了一捧海水，虽然并没有起到作用。另一次是孙悟空在朱紫国行医（朱紫国被一些学者认为位于现今印度境内）。药方中需要无根水作为药引，所以用不了河水、井水。龙王给了孙悟空两个喷嚏助力，令“文武多官并三官六院嫔妃与三千彩女八百娇娥，一个个擎杯托盏，举碗持盘，等接甘雨”。化解了国王的忧郁症和消化疾病。《西游记》中的“水难”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干旱缺水，神明也因此一民众内心的需求而被发明出来，成为典型的中国故事。

## 其他“水难”与“水怪”

干旱与求雨之外，《西游记》中的其他“水难”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渡海。孙悟空要求长生不老之道，经他的猴族长辈提醒，在花果山无法习得，只得离开家乡，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

就是渡海。他扎了一只木筏，“独自登筏，尽力撑开，飘飘荡荡，径向大海波中”。明代的西洋大海，指的是文莱以西的海域或印度洋海域。一只猴子如何独自渡海，看似是虚构笔法，显得十分浪漫。但据最新的研究，“在秘鲁亚马逊森林深处发现的4颗猴子牙齿化石表明，在数千万年前，确实有细长头的猴子漂洋过海，从非洲来到了南美洲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中国《西游记》图像历史的形成中（如插图插画）极少有渡海的画面，而在日本多种《绘本西游记》中，都曾将“悟空乘筏浮大海”作为重点改编绘画的对象，这可能与中国是一个岛国有关。他们对于海洋知识和渡海知识有更具体的经验转化为图像，对于孙悟空出海的画面也有不一样的改编创作成果，例如有的孙悟空会用到船篙，有的则不会。

唐僧的西行之路，基本是沿着陆地行走的，但也难免遇到不容易渡过的河流，如著名的流沙河（第八回），这是一条古老的河流，在宋代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中就记载玄奘法师的前世在此地被深沙神吃掉。这个水“鹅毛也不能浮，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，浮在水面，再不能沉”。深沙神，

也就是取经人沙和尚形象的前身。沙和尚在日本的形象演变类型复杂。昭和七年（1932），日本少年谈话社出版的第五卷《孙悟空》一书中，里面有一节《河童的侦查》，较早将沙僧的形象与河童的形象合一，有鸟的喙、青蛙的四肢、猴子的身体及乌龟的壳，如同多种动物的综合体。沙僧在日本的形象也不只是河童，有很多形象来源。昭和29年（1954）川端康成、阿部知二等主编的绘本《水浒传·西游记》中，沙僧还有一个典型中亚面孔的形象。猪八戒曾在天河管理水兵，水里打仗他比孙悟空强。取经人中，唯有唐僧完全不识水性。但唐僧与“水难”关系密切，他曾多次落水（如第四十七到四十九回“通天河”），第九十九回因为忘记与老鼋许下的承诺，甚至连取回的经文都全部落水。除了落水，他还曾喝下子母河的水而怀孕。以上皆属八十一难经历的厄运。但一般来说，我们还是认为，《西游记》中“山难”多于“水难”（到了明代《西游记补》中，孙悟空一直在为唐僧找寻“驱山铎”缓解师父的焦虑），成为了阅读习惯中的“刻板印象”。

虽然《西游记》基本是以陆地行旅为故事的背景，但有关“水”的威胁、恐惧和焦虑始终存在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每过一座山就会感到害怕，觉得一定会遇到妖怪。每到此时，孙悟空就会劝他不要多心，念一念《心经》，“心生种种魔生，心灭种种魔灭”。唐僧未曾提及怕“水”，“水”却是阻碍他顺利西行的重要苦难之一，他的出身故事就与水有关。直至故事末尾，他的尸体漂流在凌云渡之上，完成了佛教意义上对肉体的舍弃。由水上而来，经水上而去。



川端康成、阿部知二等主编的绘本《水浒传·西游记》